唐代和籴制度新探

卢开万

和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种源远流长的经济制度。它始创于北魏后期,经唐宋直至明清仍继续存在。和籴在唐代的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其规模之大,对保证边军粮食的供给,解决政府粮食的需求等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唐代和籴问题的研究,在七十年代以前,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看到敦煌、吐鲁番的不少出土文书,因而史学界曾存在种种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对唐代前期和籴推行的范围及其性质,以及唐代后期利用和籴对人民进行剥削搜括的手法等等,虽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各派间也存在着尖锐分歧。本文就上述一些问题,在得到史学前辈所启发的基础上,作点滴新的探索,虽不成熟,以供讨论。

一 唐代和籴的源流及唐前期和籴推行的范围

我国最早出现“和籴”这个专门名词,是北魏后期宣武帝元恪延昌年间(512—515)。太和二十三年(499)夏四月,宣武帝即位后,与南方肖齐政权的战争规模日趋扩大,大量的军粮需从后方的河、冀地区运往江、淮前缘。运输军粮成为北魏政府所面对的严重问题。大批丁壮农民被征发服役,造成自耕小农纷纷破产。《魏书》卷四十七《卢玄附孙昶传》云:

自比年已来,兵革屢动,荆扬二州,兵戍不息,钟离(今安徽凤阳一带)、义阳(今湖北北部及河南信阳一带)师旅相继。汝颍(今河南安徽间汝水及颍水流域)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今河南黄河以北及河北地区)之境,连丁转运。……细役繁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呈威福,至使通原遥眇,田芜罕耘,连村连用,蚕饥莫食。

宣武帝针对供军运输艰难的现实,因而实行了和籴,其目的一开始就完全是为了解决供应战争第一线军队的粮食。《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载:

自徐扬内附以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乃令番戍之兵,营起屯田。又收内郡兵资,与民和籴,积为边备。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设仓。乃于小平、右门、白马津、漳滏、黑水、济州、陈郡、太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运。自此费役征省。

自宣武帝延昌(512—515)以后,北魏政府在其统治区域内,东起徐兖,西至梁州,南自荆郢,北尽河北五州全面实行了和籴制度。根据分别摘录如下:

《魏书》卷七十八《孙绍传》载:

正光(520—525)初,兼中书侍郎……,久之,为徐兖和籴使。

《魏书》卷七十九《鹿念传》载:

初为真定公元子直国中尉,恒劝以忠廉之节。……子直出镇梁州,念随之州。州有兵粮和籴,和籴者靡不润屋,念独不取,子直强之,终不从命。

《魏书》卷四十五《韦阇附族侄肅传》载：

（肅）年十八，辟州主簿。……解褐太学博士，迁秘书郎中，稍迁左将军，为荆郢和柔大使。

《魏书》卷七十九《鹿念传》又载：

（节因帝元恭）普泰（531—532）中，加征东将军，转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兼度支尚书、河北五州和柔大使。

此外，高欢立元善见为帝，从洛阳迁都于鄆时，所采取的运粮措施，也充分反映魏末全面推行了和柔制度。《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载：

天平元年（534）初，神武自京师将北，以为洛阳久经丧乱，王气衰尽，虽有山河之固，土地偏狭，不如鄆，请迁都……至是复谋焉。遣三千骑镇建兴，益河东及济州兵，于白沟造船，不听向洛，请诸州和柔粟运入鄆城。

时至唐代前期，关于和柔法推行的范围，是否先推行于西北边州，然后才从西北之河西推广至中原，或是恰恰相反，由中原推广至西北边州，这是史学前辈曾有过严重分歧，而又尚未解决的问题。陈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七章“财政”中，对唐代前期和柔源流及推行范围，曾作过较详细的推考。认为和柔之法在西北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前其详虽不可考，但唐中叶后，关辅广行和柔，“其渊源所在疑舍西北边隅莫属也。”岑仲勉先生在其《隋唐史》中，关于唐代前期的和柔源流及推行范围问题，对陈先生的上述见解，提出了尖锐的批驳意见，对陈先生的论断来了一个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和柔法确不始于开元间之河西，……贞观在开元前百年，京师已设许多和柔专官。”^①进而岑先生自己提出的见解是，唐代前期和柔的源流绝非陈氏所说是从西北扩展至中原的“河西地方化”，这是陈氏“‘系统论’之成见误人不浅也。”^②而断言唐代前期西北原无和柔，是“开（元）天（宝）之际，西北用兵频繁，故就近在河西大行和柔，免运输”，“即是说，河西原无和柔，后因边军需要，乃将中原和柔法推行于河西，以充当地军食。”^③

关于唐代开元、天宝以前和柔推行的区域，陈、岑二位史学前辈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见到敦煌、吐鲁番所出土的有关唐代前期和柔文书，因而他们各自所坚持的己见，看来是可以作进一步探讨的。

岑先生在反驳陈先生的观点时，共引了七条有关中原地区唐代前期推行和柔的史料，其中最早的是贞观十四年（640）长安太仓粟窖甑，其内容是：

贞观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街东第二院从北向南第六行，从西向东第九窖，纳和柔粟六千五百石。^④

根据上引类似性质的史料，说明开元、天宝以前，在中原地区已经推行了和柔法，这是很有力的。从而就断言贞观直至开元、天宝以前，只有中原内地才推行了和柔法，而“河西原无和柔，后（开天之际）因边军需要，乃将中原和柔法推行于河西，以充当地军食。”这恐怕就难于成立了。

根据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代前期的高宗、武周时期，敦煌、吐鲁番等河西地区已经广行和柔。在现藏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2836号《大谷文书》，^⑤即武则天《长安三年（703）三月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中，就记录着敦煌县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当地已普遍推行和柔法，那里已是“和柔既无定准，自误即受单寒。”^⑥解放以后在新疆吐鲁番地区一九七三年所出阿斯塔那二百一十四号墓中，就有《唐和柔青稞帐文书》，今录如下：

（一）

（前 缺）

1. [] 圖文钱壹文余得青稞一斗
2. 绵壹屯 两屯当练一疋
准次沽(估)直银钱伍文

(后 缺)

73TAM214:148(a)

(二)

(前 缺)

1. [] 圖壹疋余青稞一石三斗
2. 右同前勘案内, 去年六月中旬 []
3. 银钱壹文, 余得青稞一斗三升, 又称今 []
4. [] 急奉进上, 遭追责
5. [] 简簸堪纳仓者, 只得一 []

73TAM214:149(a)、47(a)

虽本件纪年已残, 但据同墓所出文书纪年推知应属唐高宗年间文书。

一九七二年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八七号墓所出《唐纳和余直残文书》中, 有“ [] 纳和余直应在今帐送到新附”云云的记载。此文书虽纪年已残, 但据同墓所出一方墓志有武周新字, 推知是属武则天载初至长安年间(690—704)的文书。

这些出土文书中关于和余的记载, 与文献材料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册府元龟》卷五百零二《平余》中所载:

则天证圣元年(695)三月二十一日, 敕州县军司府官等, 不得辄取和余物。

从上引文书中可知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 敦煌、吐鲁番等河西州县已广为推行和余。《册府元龟》所载武则天证圣元年关于和余问题而发布的敕令, 是对全国各州县军司府官而发的。

由此可见, 陈寅恪先生认为唐代前期关中地区并没有推行和余, 而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 牛仙客、彭果将西北边州的和余之法“推行于关中。”^⑦以及“和余之法乃由西北地方制度一变而成中央政府制度, 所谓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⑧的论断, 未免偶失。而岑仲勉先生相反地认为唐代前期“河西原无和余”, 是开元、天宝之际“乃将中原和余法推行于河西”之说, 也同样不能说是全面的。符合当时客观历史的正确结论, 是应将陈、岑二位先生的见解结合起来, 合二为一。即开元、天宝以前的唐代无论是中原腹地, 还是西北边远地区都推行了和余制度。这正是《旧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所称的“唐初承魏制”, 全面推行和余法的具体反映。

二 唐代前期和余的强制性

关于唐代前期和余的性质, 五十年代后期, 徐寿坤先生在其《对唐代“和余”的分析》一文中, 曾认为安史之乱以前唐代的和余是不带任何强制性的, 是建立在政府和农民双方自愿基础上的。他说:“所谓‘和余’, 就是政府和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 政府于时价外加估收购农民的剩余生产物”^⑨“所以说安史乱前的和余主要是一种不带强制性的交换关系, 这是因为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交换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如前所引, ‘两和商量, 然后交易也’。可见和余和一般的交换关系没有什么区别, 所不同的仅仅在于, 农民出卖剩余生产物的对象是政府, 而不是一般人民。”^⑩

徐先生提出上述观点所用的史料是两条。一是《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一所载：

凡曰和籴，则官出钱，民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也。

另一条是《陆宣公集》卷十八所载：

此令初行，人皆悦慕，争趋厚利，不憚作劳，耕稼日滋，粟麦岁贱。

对以上两条史料，我们应持严肃的分析态度，既要弄清史料的时空条件，更要弄清原文的意旨。陆贽生于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白居易更晚，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①几十年后陆贽和白居易虽身居高官，但他们对中唐代以后的时政弊端颇为不满，往往对社会现实所存在的问题持揭露的态度。

下面我们就这两条史料的时间和原意，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首先，白居易所说的“凡曰和籴”，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时间概念，更没有确切地说这是安史之乱以前唐代和籴的实际情形，而只是一种泛指。

其次，白居易的“凡曰和籴”云云，是从字面上解释和籴的原旨，意思是说所谓和籴，“和”就应该是政府和人民“两和商量”，“籴”就应该在双方商量的基础上，“官出钱，民出谷”，以说明现在的“和籴”名不副实。

再次，陆贽所说“此令初行”，我们将其前后文引出连贯起来看，时间观念是十分明确的，所谓“此令”指的是唐德宗兴元元年（784）所下的诏令，决不是指安史之乱以前。《陆宣公集》卷十八的前后文是：

陛下顷以边兵众多，转饷劳费，设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此令初行，人皆悦慕，争趋厚利，不憚作劳，耕稼日滋，粟麦岁贱。

很明显从“陛下顷以边兵众多”云云，“此令”决不是指安史之乱以前，而是指德宗兴元元年（784）所下的和籴令。《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称：

自兴元以来，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

《册府元龟》卷五〇二《邦计部·平籴》有更具体的记载：

德宗兴元元年，闰十一月诏曰：江淮之间连岁丰稔，迫于供赋颇亦伤农，收其有余，济彼不足，宜令度支于淮南、浙东、浙西道加价和籴米三五十万石，差官船运于诸处，减价出籴（糶），贵从权便，以利于人。

所以我认为，不能根据白居易没有指明时间是安史乱前，以及陆贽明确指的是唐德宗兴元年间的两段论述，来作为论证安史乱前唐代和籴不带强制性的根据。这样把唐代前期的和籴制度理想化成不带强制性，是一种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政府和农民的交换关系，这似乎是难以成立的。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所反映唐代安史乱前的和籴，是明显具有强制性的。如上面已经提到的2836号大谷文书中，武则天长安三年（703）三月三日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就是其中一件能说明当时和籴具有强制性的典型史料，今录如下：

〔敦煌县之印〕

（前 缺）

1. 家（疑录文“家”前脱“富”字）奴客须着，贫儿又要穿衣。相学鹑望，和籴
2. 谷麦漫将费尽。和籴既无定准，自误即受单
3. 寒。岂唯虚度光阴，赤露诚亦难忍。其桑麻
4. 累年（年）劝种，百姓并足自供。望请检校营田官，
5. 便即匝（月）别点阅紫子及布。城内县官自巡，如有

6. 一家不缉绩者，罚一廻车馱远使。庶望规模
7. 递洽，纯朴相依。谨以牒举，请裁。谨牒。
8. 长安三季三匝 ㊦、录事董文彻牒。
9. 「付司。辩示
10. 一 ㊦。」
11. 三匝一㊦、录事 受
12. 尉摄主簿 付司户
13. 「检案。泽白
17. 一㊦。」

(下略)

上录文书1行称“(富)家奴客须着，贫儿又要穿衣。”意思是：富家有奴客者须有衣着，贫穷人也要穿衣。即不论贫富均要穿衣御寒，不管贫富人户都有可能承担和籴任务。对“贫儿”也要“和籴”，当然出于强制。

1至2行即是说百姓互相观望，如果把储存的粮食为了衣着而轻易费尽，将来政府分配和籴任务就无法交纳了。“和籴既无定准”，即分配给农户的和籴任务并不固定。过去没有和籴任务或所承担的和籴任务数量少，不能断言本年照旧也是这样。这说明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和籴是随政府需要而征纳，多少不等，人户不定，由政府强行规定的。

录文3至6行主要内容是，为了保证和籴谷物有着，又免百姓“赤露”无衣，要求百姓各家各户都要缉麻织布，使“百姓并足自供”，“如一家不缉织者，罚一廻车馱远使。”董文彻牒的用意是很清楚的，要求百姓不要将粮食用来买绢布或衣服。如果不这样自行解决穿衣问题，卖粮换衣就无法完成政府分配的和籴任务，交纳了和籴任务，就无法制备御寒衣着。所以说“自误即受单寒”，“赤露诚亦难忍。”据上引牒文可知当时和籴，并非出自百姓自愿，而是带有强制性的。

安史之乱以前唐政府之所以要在西北边州推行和籴，并要采取强制性的手段，这是因为缘边戍有重兵，而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称。

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

贞观年间(627—649)开始，西北地区推行和籴，即因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以及阴山以北原东突厥薛延陀部故地等缘边数十州，均驻戍重兵，营田及地租所得粮食不足供应军队的需要，于是必须采用和籴的办法以减轻漕运负担，以便解决供军问题。

安史之乱以前，唐代和籴是建立在政府对农民强制的基础上，是一种有一定报酬的变相赋税，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是反映得很清楚的。政府在各郡县将和籴粟分摊到各户，制定各户应纳和籴粟的名籍。在交纳和籴谷物时，和籴粟和其他赋税、种子粟一样，各县必须将那月那日何人交纳和籴粟多少，一丝不苟地连同纳和籴粟人的姓名交给郡仓。其手续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时间、地点、各人所纳的实际数量，收纳时的经手人，都必须用文字填写得清清楚楚交郡仓存案备查。

敦煌所出伯希和2803号文书，即《天宝九载(750)八月——九月敦煌郡仓纳谷牒》(共十六件)^⑫，是一组非常清楚完整，史料价值很高的关于收纳和籴粟、种子粟和其他赋税的重要文书。从这组文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安史之乱以前的唐代和籴是具有强制性的。

十六件文书中的第一件是记载天宝九载，敦煌县上报敦煌郡仓，关于敦煌县十三乡所纳

种子粟的总数及各乡的所纳实际数。

第二件是敦煌县百姓所纳的天九二分税，以及百姓纳和粟的具体记载，今录如下：

1. 郡 仓
2. 廿八日，纳敦煌百姓天九二分税青麦叁拾贰硕。豌豆壹佰玖拾肆硕。床壹佰肆硕。粟陆佰贰拾
3. 捌硕。已上计玖佰伍拾捌硕。又纳百姓和粟壹佰贰拾伍硕贰肆叁胜。壹拾肆硕张思贞纳。
4. 捌硕彭仁俊纳。王元曜壹拾肆硕。王怀玉陆硕。张怀感肆硕陆肆。张阿树叁硕壹肆。张文盛肆硕叁肆。张君恪肆硕。
5. 索思亮肆硕。薛崇太肆硕。
6. 同日 出青麦叁拾贰硕。豌豆壹佰贰拾捌硕。粟柒佰陆拾捌硕。已上计壹阡硕。
7. 付县便送冷泉等五戌。充马料。
8. 牒件状如前，谨牒
9. 天宝九载八月廿八日 史 索秀玉牒
10. 史 阴韶隐
11. 〔贰拾捌日谦〕 司仓参军潘
12. 司 马 吕
13. 长 史 姚

在上引文书第3行将呈报郡仓的和粟总数列举出来后，为什么3至5行文书中又不厌其烦地将各户纳和粟的数量多少，都要分头一一列举呈送郡仓呢？还要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纳百姓和粟壹佰贰拾伍硕贰肆叁胜”这个总数，与由敦煌县上报郡仓清单上十人所纳和粟的数量，两者之间是没有一点误差的。敦煌县上报郡仓的清单上列举各户姓名，虽有防止从中作弊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各户所承担和粟的任务，是由政府强制分派的。这与上引董文彻牒所说“和粟既无定准”，由政府硬性分派相一致的。如果当时和粟是完全建立在自愿基础上，不带任何强制性的一般交换关系的话，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去列举各户的姓名、数量、交纳日期呢？这就说明当时的和粟是由政府分派给各户，带有强制性的一种变相赋税。这与安史乱后和粟“散配户人”的情况大概相一致。白居易曾谈到他自己的家就是和粟户，他说：“臣久居村闾，曾为和粟之户，亲被迫感，实不堪命”。^⑬

更有意思的是十六件文书中的第三件。该文书是天宝九载九月四日，敦煌县送和粟给敦煌郡仓的牒状。因时间紧迫之故，牒状上只填“纳百姓宋希盛等和粟，壹阡柒拾陆硕”这个总数，还来不及填报各和粟户所纳和粟多少的清册，权宜之计只得先在呈送牒状上特别注明“其户人名，别状通上。”可见郡仓是要求交纳和粟时，必须将和粟户的姓名、交纳数量一同上报的。今录文书内容如下：

1. 郡 仓
2. 肆日，纳百姓宋希盛等和粟，壹阡柒拾陆硕。入东行从南第一眼。
3. 右纳得上件粟，其户人名，别状通上。
4. 牒件状如前，谨牒。
5. 天宝九载九月四日 史 索秀玉牒
6. 仓 督 张

假

7. 主簿摄司仓 苏
8. 司马 吕
9. 长史 姚
10. [四日谦]

果然敦煌县就在九月四日的当天，如期造好了宋希盛等一百余家和粟户缴纳和粟的所谓“别状”，五日呈报给敦煌郡仓。^⑭

在2803号的十六件伯希和文书中，除上述第四件，其后的第五、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件，都是敦煌县给敦煌郡仓上报交纳和粟的百姓名册。其余各件是百姓纳和粟、种子粟或其他赋税的粮食数目和名册。

上述各文书如此具体、详细、不厌其烦地将百姓交纳和粟的教量、姓名、时间上报给郡仓，说明百姓所分别承担的定额和粟任务，是由当地政府强制规定的，并不象一般市场上的粮食买卖，不管张三与李四，只要选定质量，商量好价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就算完结，用不着如此麻烦，将姓名、数量、日期都要一丝不苟的注明，并要层层上报。从而反映出它不是建立在政府和农民自愿基础上的一般交换关系。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中发现，百姓所交纳的和粟既没有不同的等次，也没有不同的价格，只要验证合格就可交纳。足见安史乱前的唐代和粟，是与交纳其他赋税的形式相类似，既有定额，亦带强制。

必须指出，虽说安史乱前的和粟带有强制性，但政府还是及时付以报酬的。但其报酬似乎低于一般的市价。据伯希和3348号文书，即《唐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粟会计牒》^⑮所载，各种和粟谷物政府都有和粟估价规定的。文书第16行“粟斗估廿七文”，第20行“青麦斗估卅文”，第22行“小麦斗估卅二文”，第24行“豌豆斗估廿九文”，第47行“床斗估廿七文。”而同是天宝时期(744—758)河西地区敦煌郡的粮食时价，要比上引的和粟估价高出不少。伯希和2862号文书《唐天宝时代敦煌会计帐》第15至17行所载：

15. 五谷 时价

16. 小麦壹斗直钱肆拾玖文。粟壹斗直钱叁拾肆文。床壹斗直钱叁拾壹文。

17. 豌豆壹斗直钱叁拾伍文。麻壹斗直钱伍拾贰文。^⑯

和粟谷物价格由政府单方面硬性规定，和粟估价低于当时五谷时价，这正是唐代前期和粟带强制性的体现。

三 安史乱后和粟的进一步蜕变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以后，就和粟具有强制性这一点而言，虽然和安史乱前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然而安史乱后，唐政府及各级官吏、地方豪强利用和粟对百姓进行巧取豪夺的手法，比之安史乱前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变得更加残忍与露骨。

安史之乱给北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出现“人烟断绝，万里萧条”的地区。州县多为藩镇所据，国家直接控制的户口大量减少，这必然严重影响国家赋税的收入。“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⑰就连中央皇室宫廷的基本生活都难于维持，“太仓空虚，鼠雀犹饿。”^⑱而政府军费和官俸的支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⑲因而唐政府利用各种形式对百姓进行残酷的搜括，和粟就是其中的一种。欧阳修在《新唐书·食货志》的序言中说：

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粟、铸钱、括苗、權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安史乱后，唐政府政令所及远比以前小，而用和籴手段所取得的粮食数量仍旧是相当可观的。据《通典》卷十二《食货·轻重》所载，天宝八载(749)各道和籴谷物数共“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石”，其中“关内五十五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石，河东十一万二千二十九石，河西三十七万一千七百五十石，陇右十四万八千一百四石。”而安史乱后虽然中央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区域大为缩小，而政府所取得的和籴粟却不断增加，特别是关内由安史乱前的五十余万石，增加到一百余万石。这说明百姓所承担的和籴任务是极为苛重的。《旧唐书·食货志》称：

贞元八年(792)十月，敕诸军镇和籴贮备，共三十三万石

.....

太和四年(831)八月，敕今年秋稼似熟，宜于关内七州府及凤翔府和籴一百万石。

《全唐文》卷四七五陆贽《请边城贮备米状》：

奏减河运脚钱，用充军镇和籴，幸蒙圣恩允许。又属频岁顺成，二年之间，沿边诸军，共计收籴米粟一百八十余万石。

《全唐文》卷五四四卢坦《请和籴奏》：

今年冬，诸州和籴贮备粟，泽、潞四十万石，郑、滑、易、定一十五万石，河阳一十万石，太原二十万石，灵武七万石，夏州八万石，振武、丰州各五万石。凡一百六十万石。

百姓不仅被迫交纳大量的粮食以完成和籴任务，而且把粮食卖出去后，所得钱绢是很少的，甚至在政府、官吏、商徒、豪强的层层盘剥下，有时百姓分文钱都得不到。他们对百姓强制、掠夺、榨取的情况主要表现为：

1. 硬性分派和籴任务，限期交纳，严加催逼

《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一载：

比来和籴，事有不然，但令府县散配户人，促立程限，严加征催。

《唐会要》卷九十载：

贞元四年(788)诏：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

《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载：

宪宗即位(806)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打，甚至税赋。

2. 以賒欠为手段，分文不付，实为强取

在一般关于和籴的奏文、诏敕中，往往说和籴时应“先付价值”，“不得賒取”等等。这正是反映当时和籴中不付价值，賒取严重的客观事实。《资治通鉴》卷二三三载有一段关于和籴问题很有价值的唐德宗李适与百姓赵光奇的对话。今录如下：

贞元三年(787)十二月庚辰，上……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年颇稔，何为不乐？”对曰：“……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亦强取之，曾不识一钱。”

又《全唐文》卷四六一陆贽曾指出：

贞元九年(793)冬至大礼大赦制：近年以来，因和市和籴欠负百姓钱物，并即填还。已后官司应有市籴者，各须先付价值，不得賒取。

3. 以质地极差的匹段支付和籴，搪塞百姓

自德宗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法后，由货重钱轻，变为钱重货轻。

政府在进行和籴时，用质地极差的杂色匹段支付给百姓。唐德宗在贞元四年(788)曾下诏曰：

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输绢绫。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②

《全唐文》卷六六七白居易《论和籴状》中曾指出：

度支比来所支和籴价钱，多是杂色匹段，百姓又须转卖，然后将纳税钱，至于给讨，不免侵偷，货

易不免折捐，所失过本，其弊可知。

4. 官吏、豪强、商人相互勾结，利用和杂从中作弊，盘剥百姓
《全唐文》卷九六七(阙名)《清贵杂便民奏》称：

每年供诸司并畿内诸镇军粮，计粟麦一百六十余万石，约以钱九十三万六千余贯杂之。是度支杂以六十，而百姓粟以二十五。农入(人)贱粟，利归商徒。

问题还不仅在于“利归商徒”，实际上卖出粮食的百姓，就连每石二十五文也是得不到手的。
《全唐文》卷六五〇元稹《长庆元年(824)册尊号赦》称：

近边所置和杂，皆给实价，如闻顷来，积弊颇甚，美利尽归于主掌，善价不及于村间，或虚招以奉强家，或广献用资于游客，若不严约，弊何可余。

综上所述，北魏宣武帝时，为了解决与南朝对峙战争第一线的军粮问题，首创了和杂制度。这一制度便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政府取得粮食的一种重要手段。

唐初承魏制，安史之乱以前，无论西北河西边州，还是关内中原地区都推行了和杂法。就其性质而言，安史乱前的和杂，不是建立在政府与农民双方自愿基础上的交换关系，而是具有强制性的一种变相赋税。安史乱后，和杂的强制性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甚至变为一种对农民进行掠夺的手段，成为农民一种灾难性的经济负担。和杂制度贯穿于整个唐王朝，在唐代的经济结构中，特别是在供军方面占有一定的地位，与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所提出的一些粗浅见解，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注释：

①②③ 岑仲勉《隋唐史》第369—370页。

④ 转引自岑仲勉《隋唐史》第368页。

⑤ ⑥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343—344页。

⑦⑧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53页—154页。

⑨⑩ 徐寿坤《对唐代“和杂”的分析》见《历史教学》1957年第2期。

⑪ 白居易的生年曾有不同的看法。现采用岑仲勉先生的考证结果。见《唐史余论》第174页。

⑫⑬⑭⑮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472—477、473—474、463、481页

⑯ 《全唐文》卷677白居易《论和杂状》。

⑰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⑱ 《资治通鉴》卷226。

⑲ 《全唐文》卷380《元吉问进士》。

⑳ 《资治通鉴》卷238载：“国家旧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钱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艰难以来，增置使额，厚给俸钱。大历中(766—779)权臣月俸至九千缗，州无大小，刺史皆千缗。”

㉑ 《新唐书》卷52《食货志》。